

# 反思传统思维方式、开展批判性思维教育<sup>①</sup>

晋荣东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rdjin@philo.ecnu.edu.cn

尽管“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sup>②</sup>这一看法可能面临“过度简化(oversimplification)”的指控，但在笔者看来，批判性思维在当代中国公共说理领域的缺失与传统思维方式之间存在关联却是可以证成的。由此，也就能够说明何以有必要通过开展批判性思维教育来彻底清算传统思维方式的负面影响，培育和提升社会成员参与公共说理的习惯与能力。

## 一、当代中国公共说理的问题与批判性思维的缺失

当下的中国社会，尚未完成从传统社会向民主、法治、理性的现代社会的转型。但是，其成员早已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分化为彼此间意见分歧日益尖锐、利益冲突日趋激烈的不同的阶层或群体。现代信息传播手段的迅猛发展与公众表达诉求和维护权益意识的不断高涨，加剧了公共舆论的多元化趋势，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不同阶层或群体之间的意见分歧与利益冲突。

理想地说，现代社会要求其成员能够运用理性的手段，通过参与公共说理来表达诉求、维护权益、消除分歧、协调利益、谋求共识。就此而言，说理是一项基本的公民能力或者公民教养，<sup>③</sup>公民说理能力的水平直接关系着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理性化程度的高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不容否认，但从总体上看，社会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理性化程度还不高，社会成员的说理习惯与能力还有待养成与提升。

一般而言，说理包括逻辑、语言和思想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从逻辑的角度来说，笔者认

---

① 本文由在两岸逻辑通识与批判性思维教学论坛（2013年8月11—12日，内蒙古通辽）上的发言扩充而成；部分内容曾以“批判性思维与当代中国公共说理”为题在上海交通大学第459期“文治讲坛”（2013年11月6日）上进行过报告。

② 参见楚渔：《中国人的思维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③ 参见徐贲：《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

为，当代中国社会在公共说理方面主要存在着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不遵守形式逻辑的情况——思维与表达不清晰、判断不谨慎、论证不充分，等等——比比皆是；

第二，诡辩式的辩证思维大行其道，貌似辩证的空洞话语常常代替了对于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和有针对性的解决；

第三，唯我独尊、不容异议的现象沉痾难愈，由此造成在说理时往往忽视论辩的完整性，遮蔽了不同意见的争论是达到真理的具体途径。

进一步看，这三方面的问题都与批判性思维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缺失紧密相关。按照恩尼斯（Robert H. Ennis）的定义，“批判性思维是聚焦于决定相信什么或做什么的合乎情理的反思性思维”，一个理想的批判性思维者应该拥有相应的习性与技能。<sup>①</sup> 而根据谷振诣结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性对恩尼斯相关论述的解读，批判性思维所要求的习性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理性态度，包括虚心、谦逊、严谨、专心、崇尚理性等；其二是批判精神，包括开放精神、兼容精神、反思质疑的精神等；其三是思维品质，包括清晰性、相关性、一致性、准确性、论证性等。<sup>②</sup> 不难发现，当代中国社会在公共说理领域之所以存在前述三方面的问题，跟批判性思维所要求的习性（以及技能）的缺失有很大的关联。也正是从这点出发，笔者以为批判性思维的缺失与传统思维方式之间存在关联是可以证成的。

## 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及其不足

对于处于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来说，除了社会、经济、政治、教育诸方面的因素，传统思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着公众有无意愿和能力通过说理的方式来表达诉求、维护权益、消除分歧、协调利益、谋求共识。

关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通过对中西传统科学思想的比较研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得出结论：不仅后期墨家和名家在其研究中表现出“一种确凿无疑的辩证逻辑而非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倾向”<sup>③</sup>，更为一般地说，“当希腊人和印度人给予形式逻辑以较早而深入的关注时，中国人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sup>④</sup> 冯契不仅赞成李约瑟的这一看法，认

---

① 参见罗伯特·恩尼斯：“批判性思维：反思与展望”（第一部分），仲海霞译，《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第13期，第14—19页。

② 参见谷振诣：“批判性思维教学的目标与方式”，《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教育通讯》，第15期，第13页。

③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6, vol.2, p.199.

④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9, vol.3, p.151.

为“中国传统哲学在逻辑思维上的特点，是善于辩证思维而冷落形式逻辑”<sup>①</sup>，而且提出传统思维方式还有另一特点，即“由于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儒术独尊，经学独断论和权威主义根深蒂固。”<sup>②</sup>近年来，一些来自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很好印证了李约瑟、冯契等人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的揭示。例如，尼斯贝特（Richard E. Nisbett）等也认为，对于中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等东亚人来说，“世界似乎比西方人看来要更复杂，对事件的理解总是需要考虑众多的因素，它们以并非简单的决定论的方式相互作用在一起。形式逻辑在问题解决方面功效甚微。事实上，过分关注逻辑的人会被认为在心智上尚未成熟。”<sup>③</sup>

善于辩证思维的特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侧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在自然观上，古代中国人主张宇宙是有机整体的元气论；认为气分为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就是道；要求从阴阳的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去把握自然规律。在科学领域，正是在这种朴素的辩证的元气论自然观的指导下，中国古代的数学、天文历法、农学、医学、生物学、音律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甚至作为文化的表达工具，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也明显地跟擅长辩证思维这一特点有紧密的联系。不过，朴素的辩证思维如果不跟形式逻辑相结合，就容易走向神秘主义和诡辩。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辩证思维的偏爱恰恰是以冷落形式逻辑为代价的，这种冷落直接导致古代中国人的思维及其表达缺乏确定性、精确性和程序性。

另一方面，自汉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派儒学把孔孟之道和儒家经典视为神圣教条，认为四书五经已经具备并把握了全部真理，后人只能对其作注释。这种经学独断论的思维方式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以一元拒斥多元。统治者运用行政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自由与宽容精神因之而丧失。此外，独断论不仅在价值观上推崇权威主义，提倡偶像崇拜，缺乏个性自主，更在说理方式上造成依傍权威、唯我独尊、不容异议。

近代以来，救亡意识与近/现代化要求的结合，促使进步的思想家对包括思维方式在内的传统文化展开批判。重视形式逻辑、提倡思想自由、主张兼容并包、反对独断论，成为西学东渐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在思维方式变革领域的积极成果。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的惰性力量估计不足，对传统文化及其现实影响，缺乏深入的具体分析，以至于在“文革”期间经学独断论变相复辟，个人迷信代替了民主讨论，即权威主义

---

① 冯契：“智慧的民族特征”，《冯契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八卷，第522页。此文原刊于《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1年第1期。

② 冯契：“《智慧说三篇》导论”，《冯契文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一卷，第29页。这篇导论曾以“智慧的探索”为题先行发表于《智慧的探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0—653页。

③ Richard E. Nisbett: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The Free Press, 2003, p.xvi.

扼杀了自由原则；摘引语录取代了科学论证，即经学独断论扼杀了科学方法。

尽管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有力地“两个凡是”所代表的个人迷信与独断论进行了拨乱反正，邓小平甚至明确提出“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参加讨论和批评的人，首先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对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给他们时间认真考虑，让他们进行合情合理、澄清论点和事实的答辩，尤其要欢迎和鼓励他们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sup>①</sup>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文革”期间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系统反思和彻底纠正。一旦经学独断论和权威主义趋于崩溃，便又走向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给思维方式的健康发展以极大阻力。这从19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在公共说理领域所经历的坎坷与存在的问题可见一斑。

笔者认为，传统思维方式的不足及其近代变形与当代流毒未能得到彻底清算这一事实，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温家宝在针对教育问题的多次谈话与批示中要强调独立思考、崇尚理性、逻辑思维、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sup>②</sup>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要强调“弘扬科学精神；……培育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sup>③</sup>

### 三、开展批判性思维教育，提升公共说理品质

对传统思维方式的不足及其近代变形与当代流毒作历史的反思与分析，无疑需要多学科共同协作，从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各方面来共同研究和综合治理。思维方式的问题虽然不能归结为是逻辑的问题，但的确与逻辑有很大的关联。而在笔者看来，逻辑不仅具有现代科学共同基础的工具价值，而且在现代性的构建与批判方面具有启发民智、转换观念、确立价值导向等社会文化功能。逻辑规律、规则与方法所体现的理性精神和规则意识，既是科

---

① 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三卷，第47页。

② 参见“温家宝接受美国《科学》杂志主编艾伯茨专访”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0/18/content\\_10213200\\_1.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0/18/content_10213200_1.htm)）；“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1-09/09/c\\_122006587.htm](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11-09/09/c_122006587.htm)）；“温家宝作报告：只有争鸣才能激发批判思维”（<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2/6/265478.shtm>）；“温家宝在清华大学的演讲”（[http://www.cq.xinhuanet.com/2012-12/28/c\\_114190463.htm](http://www.cq.xinhuanet.com/2012-12/28/c_114190463.htm)）。

③ 参见“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0/27/c\\_12708501.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10/27/c_12708501.htm)）。

学精神的基本要素，也是民主法治的基本要素。<sup>①</sup> 就此而言，对于进一步推进当代中国在各个领域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理性化，彻底清算传统思维方式的负面影响，培育和提升社会成员参与公共说理的习惯与能力，逻辑工作者责无旁贷。为此，笔者认为：

第一、针对不遵守形式逻辑、辩证思维诡辩化所存在的问题，必须在国民教育的各层次开展批判性思维教育，同时在社会上营造有利于批判性思维培育与发挥作用的氛围。“批判性思维有所怀疑，但不怀疑一切；它要求思想开明，但不摇摆不定；它善于分析，但不吹毛求疵；它毅然果断，但不顽固不化；它进行评估，但不妄下结论；它富于魄力，但不固执己见。”“批判性思维是教育中的一股解放性力量，更是一个社会能够自由而民主的前提。”<sup>②</sup>

第二、鉴于唯我独尊、不容异议带来的严重后果，必须在理念层面上确立不同意见的争论是达到真理的具体途径；在制度层面上尊重并保护社会成员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在实践层面上推行以理性论辩的方式来消除分歧、谋求共识与协调行动；在教育层面上培育并提升社会成员参与理性论辩的意愿、习惯和能力。

---

① 参见晋荣东：“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光明日报》，2006年11月27日第12版（[http://www.gmw.cn/01gmr/2006-11/27/content\\_513410.htm](http://www.gmw.cn/01gmr/2006-11/27/content_513410.htm)）。

② Peter Facione & Carol Ann Gittens: *Think Critically*, Pearson, 2013, pp.14-16.